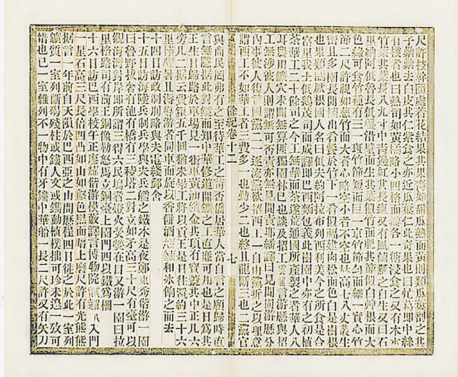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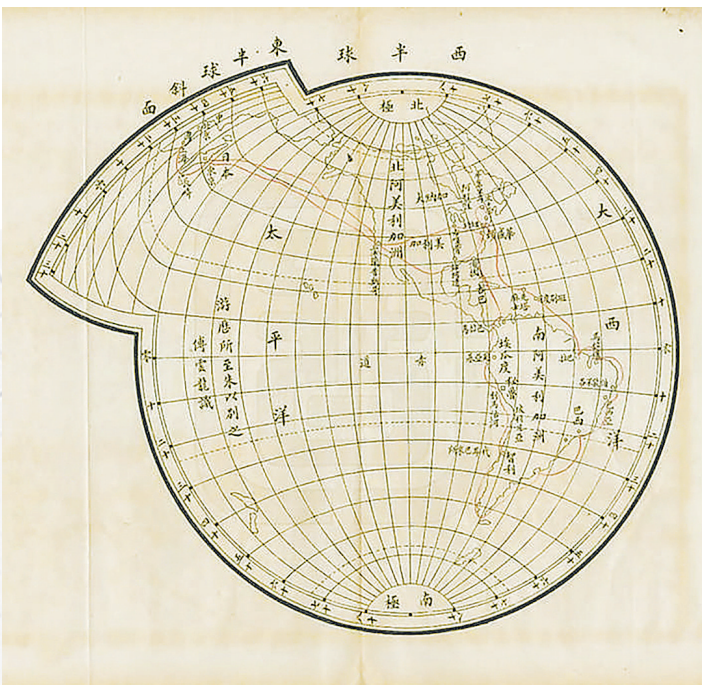


凭窗读史



傅云龙著《游历图经余记》。



傅云龙的游历路线。

晚清官员出国游历前的一次洋务考试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标志着“同治中兴”“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其后,清王朝边患接踵而起,藩属国也为列强所觊觎,从1875年马嘉理事件、1879年日占琉球、1871年至1881年伊犁危机,直到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总理衙门奕訢等负责的外交领域接连出现前所未有的难题,不间断地面临前所未有的“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

总理衙门权力大洗牌

1884年初,清军与法军作战节节失利,4月3日,詹事府左庶子、宗室盛昱上疏弹劾奕訢等枢臣怠职。8日,慈禧突发懿旨,以“委靡因循”罪名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班贬黜,命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遇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奕譞商办。

值此中法冲突交关时刻,将军机大臣全班罢免,此举空前绝后。在时人看来,奕譞、世铎、奕劻等比较庸懦,政务历练能力远逊奕訢等人,晚清官员李慈铭在4月12日记述了对“枢府五公悉从贬黜,而易中輶以驛产,代芦服以柴胡”的不解。奕劻也深知以自己的身份阅历管理总理衙门会招致质疑和非议,13日,令人值总理衙门的张佩纶上《枢臣不兼总署碍难行折》,奏请军机总署兼任,被传旨驳斥。18日,慈禧命军机大臣阎敬铭及许庚身兼总理衙门行走。19日,奕劻领衔总理衙门大臣联名再上《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亦被驳斥。

随着此次甲申易枢,军机总署分离,总理衙门人事与决策权被削弱。但奕劻出任御前大臣,任总理衙门大臣后晋封庆郡王,后又晋爵亲王,加恩世袭罔替,1885年受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权位渐崇,主持总署十七年。他虽才具平平,庸碌无为,却促成了正途官员集体出洋游历的盛举。

考试选拔海外游历使

时局巨变,但奕訢“总理”洋务时代对洋务、实学人才的求索十分急迫。1884年7月9日,国子监司业潘衍桐上了“特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折”,奏请仿照翻译例另开艺学一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李慈铭在日记中记载了潘折内容:“所陈凡十二条,言今所急者洋务,洋务所急者制造器械。请以能制器兼通文学者为东学,授文职;不通文学者为西学,授武职。其人才,凡生监、童生、俊秀皆许投考,一年一行试,三年一会试、殿试,甲第传胪,皆如武进士例,各以知县分发各省。”李氏听闻“其疏草(奏章的草稿)出于编修谭宗浚”,而潘与谭都是广东南海人,深受西洋习俗影响,“其言皆绝荒诞”。

随后,御史方汝绍上《奏请特开实学科》,翰林院侍读王邦望上《游陈艺学开科流弊》,徐致祥上《止开艺科预防微杜渐疏》,提出反对。上谕命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衙门一并讨论。8月1日,上谕公布了“会议”的结论,强调国家“设科取士”就是为了“遴选实学”,“讲求艺学”也可“兼收并取”,不必别立科目。嗣后如有“精于西法”之人,在京由各大臣保送同文馆参加考试,在地方由各省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洋务人才通过荐举入仕,潘氏等在科举内增设艺学、实学科目的倡议作罢。

1885年1月21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谢祖源上《时局多艰 请广收奇才之士游历外洋》,建议清廷遴选一批翰林才俊随同大臣出使外国,以培养外交和洋



傅云龙。

务人才,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的支持。3月27日,奕劻在《议复谢祖源奏请练习洋务人才疏》中提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他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经核实保荐后,咨送总理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上谕命总理衙门议奏和实施,但各部院一直未予落实,直至1887年1月13日,光绪帝再次谕令并“限日复奏”,六部才保荐了76名官员。据李慈铭3月4日记:“各衙门皆出单,徧询所属,问以愿否矣。翰林中愿去者,李学士及编修孔祥霖、萨廉。”这条材料非常典型,愿出国的翰林仅3人,孔祥霖是孔子第75世孙,在“世变之亟”下愿意报考出洋游历,意蕴深妙。他在1902年赴日考察学务及实业,回国后即筹建山东各地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1912年,孔祥霖辞官回到故里,组织曲阜尚实社,筹办尚实小学,以“圣裔”身份致力“尚实”之行动。

考试内容又成为重要议题。该年3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瑑莹上《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疏》,奏请将学习算学科及第者科甲出身与京职,“遇有游历员缺,即令出洋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学成后回国“专充洋务及出使等项差使”。陈的奏请被李慈铭记入5月19日记,谓:“近有御史闻人陈瑑莹,疏请自后乡会试第三场专考算学洋务,谓今诏各部院保举游历外洋人员,而应者寥寥,自以士大夫平日不肯讲求之故,宜亟重洋学以变风俗。而曾纪泽侍郎著《中国初阶论》,谓自孔门教兴,莫莫如在睡梦中,今日始稍觉悟,知西学之足贵。呜呼!彼何人哉!”与三年前对待潘衍桐“特开艺学”奏折态度不同,李氏对陈折中算学洋务、重洋学以变风俗、知西学之足贵等语未置品评,只留两句连声叹息。

在社会关注下,6月12日至13日,54名在京官员在京师同文馆内参加了

两场选拔考试,试题由曾纪泽亲拟,分别是“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皆与时务相关。初取28人,由光绪帝钦定12人为海外游历使。此事成为朝野关注热点,李慈铭将他得到的考试情况记入6月15日日记:“近日通商衙门分日考试……六部所举游历人员闻取者廿八人,兵部傅懋元(傅云龙)第一。”7月11日又记:“傅懋元来。闻懋元此次试自明以后中外交涉论,引征甚博,且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此近人邹叔绩(即邹汉勋,精天文、算学、音韵、考据、舆地)等尝言之。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之才,亦近日风尚使然也!”这两条材料透露两条信息:一是以往士大夫不屑于出洋,而现在出洋游历竟成热门,像傅云龙这样的饱学之士,中央六部官员纷纷前往总理衙门应考,足见风俗之变化;二是随着边患加剧,特别是中法战争失利及政局巨变,一些相对保守的人士如李慈铭等在经历了深刻的认知危机后,对正途官员出洋游历持接受态度,同时又从西洋科技很多源于“中学”中寻得一丝慰藉。

12名游历使兵分五路

社会舆论对此次出洋游历给予殷切厚望,《申报》9月7日《分地游历》一文说,傅云龙等十二员由总署考取出洋,“班生此行无异登仙哉!记前人有‘神风灵雾斯驂驂,大地如毯绕看三。天外有天君到否,梅花都不异江南’之句,可谓诸君咏也。但游历之举,系欲诸君周知外洋政教号令风土人情,为将来樽俎折冲之选,尚其高瞻远瞩,触类旁通,务得真诠,以洗积习。”9月12日,12名游历使兵分五路,分赴日、美、加、巴、古、英、法、德、奥、荷、比、丹、西、葡、意、瑞、挪、俄等二十余国考察。10月28日,《申报》刊布了12名游历使名单: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浙江监生、46岁),户部学习主事缪祐孙(江苏进士、33岁),刑部学习主事顾厚昆(江苏进士、44岁),兵部学习主事刘启彤(江苏进士、33岁),兵部候补主事程绍祖(江西监生、38岁),礼部学习主事李秉瑞(广西进士、32岁),刑部候补主事李瀛瑞(山东进士、40岁),刑部候补主事洪勋(浙江进士、32岁),户部候补员外郎徐宗培(顺天监生、32岁),户部学习主事金鹏(广西进士、32岁)。这些科举正途出身、年轻、文化素养高、官居六部五六品级的官员,奉诏出游异域诸国,即如《申报》11月10日《论游历人员之尊重》所言,使命至重。

两年间,游历使们以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富国强兵的赤子之心,不负嘱托,按总理衙门出洋游历要求,广咨博访,采风问俗,撰写刊印了大量考察报告、游记日记,对国人了解外洋之山川风土、地理人情,增长见识,力破积习做出了贡献,这是总理衙门“总理”洋务几十年的一大成效。

赵雅丽

还原真实的“大宋提刑官”

透过史料看宋慈及《洗冤集录》

谈到宋慈,相信很多人立刻想到众多电视剧,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大宋提刑官》。宋慈所撰写的《洗冤集录》自淳祐七年(1247年)面世以来,数百年来“听讼决狱,皆奉《洗冤集录》为主臬”,成为后世断案的重要依据。此外,《洗冤集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比1602年在意大利出版,由菲德里(Fortunato Fedeli)撰写的《新编法医学》整整早了355年,所以宋慈也被称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真实的宋慈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不妨透过历史文献来看看。

一流的工作能力

说来有意思,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关于宋慈的历史文献并不多。现代学者研究宋慈,更多的是依靠其福建老乡、南宋诗人刘克庄所写的《宋经略墓志铭》。

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福建建阳人(今福建建宁),嘉定十年(1217年)中乙科进士。南宋时期的科举竞争非常激烈,就算考中,也不是立刻能够做官,即使有工作,往往也是从吏开始,宋慈就是如此。宋慈之所以后来能够提干,靠的是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没错,不是查案,而是平定地方暴乱的能力。南宋名臣、陈韩手下主将王祖忠称赞宋慈“君智勇过武将矣!”通过战功,宋慈从吏提升为官,“三峒平,幕府上功,特授舍人官”。

作为地方官员的宋慈,积极为民众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可以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地方官。

从绍定四年(1231年)开始,宋慈开始担任福建长汀知县,主理地方行政工作。针对当地民众买盐贵的问题,宋慈通过运盐线路的调整,让民众很快吃上了低价盐。嘉熙元年(1237年),宋慈任邵武军通判(州府官员的行政助理)之后,由于浙西的饥荒,临时又被宰相李宗勉派去出任毗陵郡守。面对当地一斗米值万钱的现状,宋慈言道:“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柴以邀利,吾当伐其谋尔。”针对那些大户隐匿户籍来逃避赋税,囤积大量粮食牟取暴利的行为,宋慈决定想办法对付他们的这些诡计。

他当即推出了具体细则,把户分成五等,最富有者交出存粮,一半用来救济、一半用来售卖;较为富有者拿出存粮,只用来销售;中等人家既不需要拿出存粮,政府也不给予救济;较贫困者,政府部分救济,但也得自己购买一些粮食;最困难的人则是由政府来买单,通过这些办法顺利让老百姓渡过难关。

经过宋慈的治理,在他卸任的时候,为当地留下了“余米麦三千余斛、镗(银两)二十万、楮(chǔ,楮币,纸币的别称)四十万”。这工作能力,放到哪个朝代应该都会是备受认可的地方官。

不自知的“法医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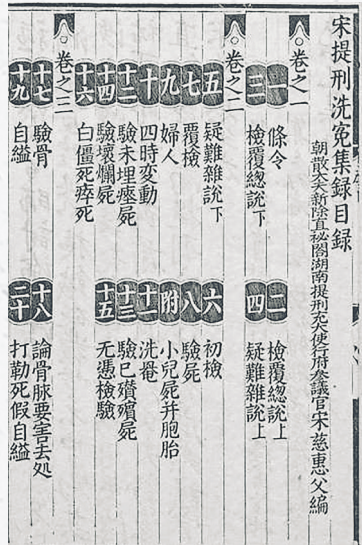
《洗冤集录》的写作,还得回到嘉熙三年(1239年),也就是宋慈担任广东提点刑狱的时候。正是因为到了广州,宋慈发现“南吏多不奉法,有留狱数年未详覆者,公下条约,立期程,阅八月决辟囚二百余”,也就是当地官吏大部分并不遵守法令,很多案子压了很多年也没有人处理;于是宋慈就制订相关要求,确定结案的日程,八个月过去后,囚犯就处理了两百多人,这效率,也颇有当年狄仁杰“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的味道了。宋慈自担任广东提点刑狱后,又担任过江西提点刑狱,一直到淳祐七年(1247年)担任湖南提点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终于完成了《洗冤集录》的撰写。

《洗冤集录》与过往一些主管司法行政的官员所写之书有很大的不同。北宋末出版的《疑狱集》以及南宋的《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中记录的是一个完整的案件,甚至可以当成探案故事集来看。反观《洗冤集录》,会发现宋慈极少讲案例,而是详细写为了断案的细节,分门别类进行了归纳总结。

想象一下,要是作为宋慈的下属,这部书简直就是出门断案必带的工作指南,该如何观察、如何判断、宋慈都说得清清楚楚。比如自缢横梁上灰尘是否杂乱,都能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或在屋下自缢,先看所缢处樑架枋桱之类,尘土衰



《大宋提刑官》中,何冰饰演宋慈。



《宋提刑洗冤集录》。

乱至多方是。如只有一路无尘,不是自缢”。如果对涉及案件的相关法律条款不熟悉,更是可以直接翻看《洗冤集录》卷一,他把条目一一都列出来了,甚至把当时法律中的处罚细则也都列出了。

正如宋慈在《洗冤集录》序文中所言:“年来州县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作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针对州县往往安排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官吏来查处案件,这些“职场小白”没啥工作经验,往往被周围狡诈的仵作、吏胥(基层小吏)所蒙蔽。面对这些问题,宋慈强调作为司法官员工作的重要性——“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案件中没有什么比判处死刑更重的了,而定罪首先就要搞清楚案件的情况,就必须要做好相关的检验工作,这是后续断案、定罪的基础。这也是宋慈写出如此分类清晰、内容严谨的《洗冤集录》的核心动力。

当下世人给予宋慈的“法医学家”的头衔,宋慈活着的时候是断然想不到的,其实他只是在解决他所面对的工作问题而已。

《洗冤集录》: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

通过《洗冤集录》,可以看出宋慈深受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既磨砺自身,更是造福了百姓。

宋慈自幼就跟随“考亭高第”吴稚学习,“考亭”指的就是朱熹的考亭书院,南宋读书人的圣地,算起来朱熹也算是宋慈的师爷。朱熹定居福建建阳时,宋慈也不过刚刚5岁,等宋慈14岁的时候,朱熹去世。按常理推测,宋慈一定是见过甚至与朱熹有过交流的。19岁时,宋慈又转战临安太学,算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了,在这里他的老师是朱熹再传弟子、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真德秀曾看过宋慈的文章,感觉他的文字都出自肺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今天,由于各类电视剧的塑造,让很多观众认为《洗冤集录》就是宋慈个人工作经验的总结,或是来源于父亲的经验传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宋慈父亲宋巩中进士时,老先生已经68岁了,三年后,宋慈中进士。宋巩虽是大器晚成,但毕竟年龄太大,工作没几年便离职回家,实在不能为宋慈积累太多的基层工作经验。宋慈在《洗冤集录》自序中也言道:“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切切实实告诉我们他的书的源头在哪里。主要还是来自“自《内恕录》以下”的相关书籍。他梳理前辈同仁的资料,同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会而粹之,厘而正之,

增以己见”,从而创作出这部法医史上的巨著。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的第一个故事里,宋慈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害者到底是不是因火灾而亡?根据《洗冤集录》,可以通过检查尸体的嘴巴和鼻孔中是否有烟灰、手脚是否蜷缩来判断。向上追溯,这种判断方法在北宋出版的《疑狱集》中“张举烧猪”的案例中已经谈到了。《疑狱集》包含了一百多篇从汉朝到五代时期的案件,仅从文字来追踪的话,《疑狱集》中的《张举烧猪》实际上又是选自北宋的类书《太平御览》,而《太平御览》中的《张举烧猪》又出自西晋官员张勃所写的关于东吴的历史书《吴录》。

这则《张举烧猪》案例中这位英明的句章县令,可以说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审判案件中就已经开始用动物实验得出的结果作为依据来判处罪犯,但也这远非中国法医的开端。宋慈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法医学鼻祖”,是站在诸多“法医”前辈们的肩膀上才取得的成果。

时代的回应

正如学者沈玮玮所言,“《洗冤集录》能成为世界上首部法医学著作,与宋代流行的类书编纂技术紧密相关”。按照现有的定义,“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工具书”。我们熟悉的《永乐大典》也是类书,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按门类、字韵排列——这一点也算是《洗冤集录》与《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司法类书籍非常明显的不同。

换成当时读书人的视角,类书更类似“科举辅导书”或者上岗后所用的工具书,想来这也是《洗冤集录》能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哪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是要买辅导材料的,类书当年绝对不愁销路,此外,宋慈家乡的福建建阳作为南宋的出版重地,也为《洗冤集录》的出版发行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一本法医专著,《洗冤集录》虽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传播到海外,但关于宋慈的介绍,《四库全书》中仅为“宋慈始末未详”,此后清代陆心源《宋史翼》中的《宋慈传》也不过是刘克庄所写的《宋经略墓志铭》的翻版罢了。想来也是正常,与宋慈相比,还有太多司法同行及他们的著作都消失在漫长的历史中。《洗冤集录》序文中提到的《内恕录》现已失传,可以查阅的宋代司法类案集不过只剩下《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书目,但《洗冤集录》中各个分类的具体内容实实在在的靠着这些书中的案例细节来支撑的。历史最后把功绩落到了宋慈身上,也算时代对历史上无数从事司法工作的“宋慈们”的一个迟来的回应。

郭苑洁